

反制宰制——博物館人的能動性 與政治行動

劉婉珍¹

摘要

有人的地方就有政治，博物館工作者的生活世界充斥著專業與非專業、理性與非理性、公益與私利、理想與現實及權力遊戲與文化政治的拉扯折衝。不管是否知曉明白，或是否願意面對所處的社會脈絡與工作環境，博物館工作者都無法「置身事外」而隱世獨行。

本文嘗試以博物館社會行動論的觀點，關注博物館工作者如何行動或調整，以適應彼此和博物館場域。藉由意識科學及認知心理學的思考理路，探析博物館工作者在其生活世界中發展能動性的機制。透過社會學及文化研究的視角，透視博物館工作場域的現實來思考政治行動的意義。提醒博物館人正視博物館場域中權力運作以及機構文化轉變的事實，不再漠視或被動順應接受，而必須主動發展創造有價值的政治方案，展現專業自主性及道德勇氣。

最後並藉由批判教育學的意識化學習概念與反思實踐過程，說明博物館人發展能動力與政治行動的可能性。透過博物館專業實踐社群的建立與發展，博物館人得以獲得相互分享、對話的思辨機會與刺激，增強反思及反制能力，培養解構與再建構博物館政治環境的能力與行動；讓自己與博物館不再只求存活，而能充分發揮存在於世間的意義。

關鍵詞：博物館政治、博物館社會學、意識、意識化、能動性

¹ E-mail: 054117@mail.fju.edu.tw

博物館是人們進行理解與詮釋的認知空間 (cognitive space)、個人記憶與集體記憶互動的社會空間 (social space)，以及釋放情感和進行創意性思考的夢想空間 (dream spaces) (Kavanagh, 1996)。博物館為重要文化機構，是能量體，於所在社會、政治、經濟和文化脈絡中運轉發功。

〔博物館是〕知識及靈感的根源、思想和經驗探究的安全場域、社區中不可缺少的重要夥伴、經濟的火車頭、公民自豪和成就的來源、知識經濟中社會轉變的催化劑以及夥伴、共享資產〔包括人類偉大成就和自然珍貴資產〕的管理者。²

博物館為大眾而生，在人類社會中扮演重要角色。博物館可以為任何人所有，但唯有能與博物館語言符碼互動的人，博物館才會在其真實世界中產生實在的意義，然而「博物館語言符碼」的形塑，來自於治理單位（主管機關）、館長以及各部門館員等的交互作用力。博物館是想像的共同體，而此共同體本身即存在著多元發展的相互競爭性。博物館是一個「意義」爭辯的場域，各種攸關蒐藏及再現對象的文本爭相競逐取得優勢，以獲得「發言權」及「登臺權」。

博物館蒐藏、保存和研究文化資產，進而以展覽及活動方式再現文化和相關意涵。而文化蒐藏與再現的問題是「政治的」，實務行動的過程與權力密切相關。博物館工作者的真實環境是專業與非專業、理性與非理性、公益與私利、理想與現實、權力遊戲與文化政治拉扯折衝的生活世界，換言之，博物館的實踐是在權力中建構而成。人們常心悅誠服、毫不質疑的全盤接收博物館公

諸於世的面貌。然而，各種權力在博物館互為影響的過程與牽扯，往往遠比我們所能想到的更為複雜。

絕對主觀的宰制

管理學之父彼得·杜拉克 (Peter Drucker) 名言：「我們對未來最大的確定就是它的不確定性！」(楊少強, 2005: 54)。身處新風險以及不確定性的「失控世界」(runaway world) (Giddens, 1999; Beck, 1995)，許多博物館在重新尋找認同以及社會定位的過程中，以獻出主體性的方式生存發展。漢寶德 (2004) 觀察臺灣博物館的發展，曾語重心長地指出近年來博物館「對於專業人才的觀念不清」、「放任外行冒充內行」、「以建築矇騙觀眾」、「博物館成為策展人意識型態表達的舞臺」以及「以行銷為最高目標」的誤行事實。筆者分析造成這些現象的原因，在於博物館受其利益關係人 (stakeholders)，如治理機構長官或委員 (Governance, G.)、建築師 (Architect, A.)、策展人 (Curator, C.)、館長 (Director, D.) 等絕對主觀宰制的結果。

當博物館遇到以主觀意識強行主導博物館政策發展與策略規劃的中央或地方治理機構負責人、承辦人或民意代表，透過議會質詢強行「建議」博物館調整政策等，我們或可將此形容成「博物館與大G相遇」。不論是否真正知曉博物館事務或具有博物館專業治理能力，治理單位若以絕對主觀的治理態度行事，便會罔顧博物館專業主體性，未經審慎評估而率性地做出「任用非博物館管理專長者出任博物館館長」、「刪票方式讓博物館為更多大眾服務」、「刪

² <http://www.aam-us.org/am07/prop-theme.cfm> (瀏覽日期：2006/05/29)。

減研究人員編制及預算以節省成本」等決定。而所謂「對於專業人才的觀念不清」、「放任外行冒充內行」等後果，則造成博物館專業特質與定位的模糊不清。

當博物館「自負盈虧」，甚至「為政府賺錢」的想像與期待，普遍存於中央及地方政府官員心中，博物館主管機關、治理單位錯置的想像即直接影響博物館原有的主體性，甚至逐漸讓博物館失去自身之於博物館的思維與認識，衝擊原有博物館的發展與轉變。

當博物館遇上主觀意識強的知名建築師進行博物館建築設計，不論是新館規劃或是舊館改建，建築師個人的創作理念與藝術表現常凌駕博物館文物典藏及展覽活動等實際需求，這樣的情形，我們可說是博物館與大 A 相遇，大 A 以意識型態霸權的方式讓博物館主體噤聲。位於義大利羅馬，甫於 2010 年 5 月 30 日開幕的 MAXXI (義大利國立 21 世紀藝術博物館) 可視為「博物館與大 A 相遇」的代表案例。

20 年前，義大利想蓋一座未來博物館，12 年前，義大利文化部公開招標，全球 273 位建築家競逐，最後由旅英的伊拉克裔女建築家哈迪德 (Zaha Hadid) 脫穎而出，以非凡的結構和創新的造型體系獲得評審團隊青睞。MAXXI 占地 27,000 平方公尺 (約 82,000 坪)，造價 1.5 億歐元 (59 億臺幣)。該館由水泥和玻璃組成的龐大空間，優雅的造型，蜿蜒而上的曲線，瘋狂的幾何結構，具史詩般的氣魄。然而，這樣的空間是否符合未來藝術品的展出則值得商榷，因為女建築家在開館前已設限，未來博物館的牆上不准掛上畫作 (陳玉慧，2010)。哈迪德大師遊走於建築學界及藝術界，得過建築界最大殊榮普立茲克獎 (PRITZKER)，氣勢磅礴的 MAXXI 無疑是哈迪德個人建築藝術的紀念碑，但卻可能是很不稱職的美術館空間，難以滿

足美術館典藏及展示功能 (Woodman, 2010)。

這樣的案例中外比比皆是。近年來許多博物館與知名策展人合作時也常不得不將博物館自主性豎之高閣，讓「博物館成為策展人意識型態表達的舞臺」。響譽國際的個人策展者，或是握有宣傳利器及負擔多數成本的大眾傳媒策展公司，曾幾何時已逐漸變成讓博物館釋出論述權的大 C (curator)，成為占有新興地位的新霸權。

博物館的專業主體性在與大 A 及大 C 相遇時常常蕩然無存，需要面對的往往是讓大 A 或大 C 個人秀推出後，再由無辜的館員辛苦進行後續補救工作。博物館有其必要的需求與功能角色，將其專業主體性獻出後，則仍須事倍功半的設法維持運作，或處理權力暫時位移後的「災後重建」，必須面對並處理問題的館員則有苦難言。

兼具領導、管理博物館運作發展，以及與治理單位溝通協調責任的館長，係博物館在現今社會是否能扮演有意義角色的關鍵人物。1994 年，美國紐約現代美術館與波士頓美術館等十餘家大型博物館找不到適任館長 (Suchy, 2004: 4)。美國博物館近十年來受到市場競爭與財務危機的生存挑戰，迫切需要能夠帶領博物館在巨變中生存發展的館長人才。而在臺灣，政治影響力決定館長去留的現象有增無減，越來越多與博物館不太有接觸的學術或官僚體制之行政機構主管，得以被「拔擢」為館長。也有些人因在營利機構的輝煌成功經驗而受命到博物館再創佳績，表現傑出的博物館研究人員、大學教授、研究員或藝術家獲當館長的案例亦時有聽聞。

博物館館長頭銜彷彿社會地位晉升的象徵，館長光環有時讓這些不具有博物館經營管理專業職能的「社會傑出人士」忘記或忽略學習及專業的必要，卻以本身特定專業學科思維或官僚經驗進

行館長決策；或認為博物館即是展現大D (director) 權力的個人實驗場，無法以整體機構觀點進行考量，以似是而非的觀念盲目衝刺發展博物館事業，將博物館變成其短期暫留的政治舞臺。

媚俗的博物館管理者為了追求業績，就會以聳動為其思考基點、崇高化數量的地位、棄其他的價值如敝屣。由於無法避免權力操控，再加上短線操作、時間不足，便不免以炒作式的、拼貼式的工作方式衝刺業績，不過是一套走江湖、賣膏藥的伎倆，營造人潮洶湧的虛象 (王嵩山, 2005: 102)。

為什麼這樣的現象與實況存在於博物館生活世界？為什麼博物館會順從於大G、大A、大C、大D等絕對主權的霸權下？社會學有關意識型態及其霸權的論述觀點有助吾人理解及省思。著名社會學者哈伯瑪斯 (J. Habermas) 認為虛假 (false) 意識是「集體的或心理互動的 (inter-psychic)，形成一種意識型態或自我欺騙的形式」，並同時限制人們的經驗，進而對思想與行動形成一種壓抑 (Habermas, 1987: 234)。葛蘭西 (Antonio Gramsci) 提出相似看法，並將此過程與結果視為一種霸權。

它會凝聚某個特定的社會團體，運用各種策略，有效地影響道德行為與意志走向。這類策略雖然五花八門，但通常都具有足夠的力量創造出一個由矛盾意識狀態來主導、封殺所有行動、決定或選擇的情境，同時也帶出一種在政治上與道德上消極被動的景況 (Gramsci, 1971: 34)。

文化霸權的營造和崩解是持續進行的過程，文化是意義鬥爭的場域。意識型態提供人們實踐的準則，如一張張有利於特定社會團體鞏固權力的意義地圖

(Gramsci, 1971; Barker, 2003)。意識型態係一個文化中的優勢信念與想像，不斷地試圖將個體定在資本主義關係階層中，讓人們變成意識型態下無力的抵抗者。人們會如何賦予事物意義、詮釋文本以及產生意義的方式，都來自人們在文化中如何被定位 (positioned)。人們依賴於知識與意義 (象徵) 的存在籌碼，大部分是由已存在 (pre-existing) 的機構、意識型態國家機器所補充，意識型態是文化的表意鬥爭持續地被形塑，而在形塑的過程中，也不斷受到挑戰，那些在當代文化中具有優先地位的意識型態，仍受制於動態的文化力量 (Lewis, 2002)。如此，則不難理解在博物館生活世界中，博物館工作人員如何被不同利益關係人 (stakeholder) 的意識型態霸權所宰制與探尋可能的新路。

意識型態 (ideology) 最早於1796年出現在英文裡，意指思想的科學；19世紀之後，此字意含抽象、空想及激進理論，而在馬克思與恩格思的作品中將意識型態視為幻象、虛假意識、上下錯置之現實、非現實等意涵，這樣的意涵頗貼近現今用法 (Williams, 1983)。相對於意識型態的虛假，科學性的意識呈現真實與有效。恩格思認為人們一旦明白他們實際生活狀況及真正動機後，意識型態便會終止，之後他們的意識就會變得真正具有科學性 (Suvin, 1976)。身處社會劇烈變動的時代，傳統態度與方式不再能有效地回應環境生態，博物館從業者，包括館長、館員以及和博物館合作發展方案的建築師、設計師、策展人等，必須有心關注並學習博物館的任務與活動，讓科學性的清楚意識發展並產生作用，否則博物館脫序試行的劇情會不斷上演。

許多即使是受過高等教育者，一進博物館事業時常常失去方向，原因是他們並不學習博物館的任務和活動。對這

些工作人員只有兩種選擇，一是離開這個行業，二是他們就以自己的專業來發展博物館，造成博物館的負擔和與社會的疏離（Stransky, 1983: 2；轉引自Waidacher, 1993；五觀譯本，2004: 307）。

博物館是學科統整的場域，以跨學科合作的方式完成文化保存維護、詮釋溝通以及機構經營發展，而不以原有學科知識及意識型態發展博物館。博物館從業人員藉由學習「明白他們實際的生活狀況及真正動機」，發展科學性的意識，博物館才能在保有專業主權的情況下，增強免疫力，抗衡環境中容易讓博物館「發生病變」的「病源」。

摒除有意利用博物館成就自身個人聲譽的短期「客串者」，凡是以博物館專業發展為職志的博物館從業人員，皆應藉由發展清楚意識的反思實踐歷程，培養體現博物館價值的能動力和政治行動，為博物館認同危機與脫序亂象找到活路。

相對主觀的反制

社會學二元論所指稱的客體／主體、社會／個人，並非兩種客觀實體，而是相互構成（du Gay, 1996）。社會、文化及個人之間為彼此的必要條件，社會化機制將知識授予個人，社會得以運作，而個人也在被授予的事物中創造文化，社會與個人二者相互展現與建構（Berger and Luckmann, 1966）。博物館工作人員因為意識的覺醒，且具有科學性的意識，清楚明白所處的生活世界，才有可能使自己與博物館提昇與發展。

意識的覺醒如此重要，那麼何謂意識（consciousness）？心理學界將意識視為「個人與環境互動所得經驗的總體」；「當事人自己所能內省的一切心

理活動」；「個體與環境互動時，對自己所作、所想、所感、所知的、內在的、主觀的瞭解，均為意識歷程。意識歷程可簡稱為意識或意識經驗」（張春興，1989: 149）。印度及西藏等地探究人類認知及意識有其長遠歷史，意識問題吸引佛學、哲學思想家的關注；意識科學在西方世界發展雖緩慢，但已逐漸被科學家注意（Dalai Lama, 2005；南懷瑾，2006）。

達賴喇嘛十四世近年來關注並著書推動意識科學的發展，認為「意識」是一種人們能認知、會自省的思考特質。其專書中說明印度和西藏佛學思想體系認為「意識」包含兩個特徵（feature）：一、明亮（luminosity）或清楚（clarity）；二、知曉（knowing）或認知（cognizance）。「清楚」係指能夠展現（reveal）或反省（reflect）的心智能力，「知曉」則指能夠感知（perceive）的心智機能（mental states' faculty to perceive or apprehend what appears）（Dalai Lama, 2005: 124）。人的意識係認知、自省的的心理活動及主觀經驗，意識的覺醒與科學性活動在生活世界中有其不可或缺的重要性。

心理學將「後設認知」（metacognition）視為一個人對自己認知歷程的知識與察覺，不僅是「知其然」，而是「知其所以然」。研究後設認知的著名心理學家佛萊渥（J. H. Flavell）指出後設認知之歷程包括後設認知知識（metacognitive knowledge）和後設認知經驗（metacognitive experience）。後設認知知識係指對自己既有的知識能夠在不同時機予以選擇、組織、支配的高一層知識；後設認知經驗係指個人從認知性活動之後所獲得的理性的與情意的綜合經驗（張春興，1989: 406-407）。前述的科學性意識與後設認知的發展有關，清楚明白並反省所在博物館工作環境的事物現象，博物館工作者具備這樣的意識，是博物

館的生命意義與價值得以延展發揚的重要條件。在博物館生活世界中持續保有這樣的意識，才有可能獲得如「一燈能破千年暗」的覺醒覺知。

博物館為大眾而生，新博物館學強調觀眾應成為具有批判、思考、判斷能力的博物館參訪者（critical visitors）（Hooper-Greenhill, 2006），而博物館館員更應是具有批判、思考、判斷能力的政治方案行動者（critical museum worker），在實踐博物館理想與價值時，展現其專業道德勇氣。以文化研究的觀點而論，不論是具有批判力的觀眾或是具有批判力的博物館工作者，皆須擁有能動性（agency）。

值得注意的是，「能動性」是指擁有主體的人們具備獨立與思考的能力，卻又受到制度和社會結構權力所決定。傅科（M. Foucault）認為主體是論述所建構，是權力的產物，論述規範人類在社會和文化情境下能說什麼，規訓現代性（disciplinary modernity）的真理政權包括權力與知識的關係；知識是權力的展現形式，並影響主體性的生成（Foucault, 1977, 1980; Rabinow, 1984）。換言之，能動性是個人建構其行動方案的能力，但主體是權力的產物，是論述建構，是權力的生產特徵，能動性是社會建構出來的行動能力。能動性與活動不一定有反抗的意義，能動性可以是對霸權價值的肯定行動，活動也可能只是接受意識型態所必須的（Barker, 2003）。

誠如學者柏格（P. L. Berger）所言：「它〔社會〕是由人類的活動及意識所構成，社會現實不能和人類切割開來，人是社會的產物。每一個個別的生命歷程都是社會歷史的一部分，一方面帶領社會發展，同時也在社會中掙扎生存。」（Berger, 1969: 3）社會學者紀登斯（Anthony Giddens）亦提醒：人是主動且有見識的行動者，同時也是被階

級、性別和族群等社會結構所形塑，並複製這些社會結構（Giddens, 1984）。

明白個人能動性以及社會權力結構型塑的相互關係，不禁要問：在脫序變動的博物館社會中，博物館工作者如何發揮能動性，進行反抗或改變？筆者發現意識科學以及傅科晚期的著作論述，有助於我們思考。傅科在20世紀1960年代的知識考古學研究，1970年代的權力論述，揭露個體如何被他者（如社會規範）透過主流論述實踐構成主體。1980年代的學者（如：Rabinow, 1984; Foucault, 1986）關注「自我的倫理學」，強調倫理論述是我們形成自身，讓我們自己得以存在（bring ourselves into being）的方法；試圖提醒人們關注個體自我創造的自由和自律，個體如何通過一套倫理學和自我塑造的技術來創造他們的同一性。傅科從投入反思和批判社會規範的控制系統，進而轉向強調個體如何從自我認識、自我構成與反思實踐，透過「自我的技術」（techniques of the self）和「關注自我」（care of the self）的倫理學問題，獲得足以和「社會決定」抗衡的主體性與能動性。

身為博物館社會中的一部分，博物館工作者在博物館社會中掙扎生存，但同時也對自身所處的環境具有影響力，能在博物館生活世界中，發展出清楚意識，進行關懷自我的反思實踐，係博物館工作者讓自己與博物館獲得存有意義的活路。然而，走出活路需要堅持的毅力、誠實面對與批判的勇氣，透過持續與環境、自身及他者省思對話的「意識化」學習過程，方能有效發展能動性，採取有利及有力於博物館與社會的政治行動。

意識化學習與政治行動

沒有經過解放、批判的歷程，博物

館工作人員對博物館價值的理解可能被政治和經濟等非教育力量與壓力所瓦解，博物館價值的實踐也可能因機構的結構或某種意識型態而有所阻礙。因此博物館工作人員思考學習博物館的使命任務和活動，發展認知與反思的清楚意識，進而回應到實務行動的歷程，其重要性已不言而喻。辛肯（Donald Schön）指出「反思實踐者」（reflective practitioner）不但能夠在行動中反思（reflection-in-action），亦能夠在特定時刻將自己抽離出來，並且針對行動進行反思（reflection-on-action）。然而，博物館工作人員就和大家一樣，沒有人是天生的反思實踐者，清楚意識與反思實踐是學習發展而來的（Schön, 1983）。

教育學者賈維斯（Peter Jarvis）把人類學習類型分為三種：非學習型的人不是不予思考（nonconsideration）地對所處情境沒有回應，便是機械性地依賴既有的假定（presumption）回應所處情境，或是直接拒絕探索與嘗試經驗世界；非反省型的學習者對於周遭人事物，不是停留在意識的邊緣或想像的外圍，便是止於技術性的學習（skill learning）或單純進行經驗的記憶；反省型的學習者不但會沉思（contemplation），亦會在反思中學習新技巧，從具體經驗中進行觀察反省，並將所得予以概念化與推論，進而主動採取嘗試行動（Jarvis, 1992）。許多博物館工作者每日忙於應付排山倒海而來的例行性工作與臨時交辦任務，逐漸變成「心亡」的埋頭苦幹者。就如紀登斯所觀察：有些行動力旺盛的人雖有實際的行動，但對他自己的行動卻缺乏一套清楚的理論意識（Gramsci, 1971）。

透過批判教育學者弗雷勒（Paul Freire）所提出的「意識化」（conscientization）過程，博物館工作者或能發展清楚意識，在所屬的社會環境中展現真正的能動力。意識化係指「人們做為知

的主體，而非接收者，以達到塑造其生活與轉換其實體能力的社會文化現象的深層覺知過程。」（Freire, 1972: 51）弗雷勒投入巴西成人教育實務工作多年，以教育行動研究發現，參與成人在意識化的過程中，學習自己可以存在世界中，而非僅是存活下來，他們覺知到自身工作的價值，且這種方式可以轉換世界，在意識化的轉捩點上，人們得以對世界進行批判反省（Freire, 1972: 53-55）。馬濟洛（J. Mezirow）亦以觀點轉換學習（perspective transformation learning）說明人們從後設認知的學習過程中，瞭解所有的立場在某種程度上皆具有意識型態。觀點轉換學習係透過批判反省的過程，促使人們從扭曲的認知中解放，並發展出新的參考概念架構，進而促使學習者形成新的世界觀（Mezirow and Associates, 1990）。弗雷勒比馬濟洛更強調反思行動，相信經由批判反思過程與之後的行動，人們得以轉換世界。

部分博物館工作者雖已接受教育學者辛肯所提的「反思實踐者」概念，但大多數博物館仍未能將「對博物館領域的深層瞭解」視為實踐的基礎（Silberman and O'Neill, 2004: 38）。

博物館機構文化是政治的，身處階級權力的社會關係中，博物館工作者的意識化過程需要有持續批判對話思考的機會與場域，才有可能發生觀點轉換。思想解放批判的理性溝通與對話，需要讓自己感到安全且「德不孤、必有鄰」的同伴，博物館專業實踐社群的建立有其必要性。

實踐社群與專業倫理

「實踐社群」（community of practice）

意指「一群人分享共同關注的問題或對一特定主題的熱忱，並在持續的互動基礎上加深此領域的知識與專業。」(Wenger et al., 2002: 4) 博物館的實踐社群有可能在館內，也有可能由跨機構的夥伴共組，形式各有不同，但所有成員必須是關心這個領域的人，有共同的實務以及特定關注的知識領域，並想要在領域中發展得更有效率或解決問題。

簡言之，他們（實踐社群）係指人們以非正式的方式為同一事業分享專業（expertise）及熱忱（passion）所結合的群體（groups of people）。實踐社群的成員以自由流動（free-flowing）、創意（creative）的方式，發展出解決問題的新方法（new approaches）(Wenger and Snyder, 2000: 139-140)。

「實踐社群」的團體學習與動能性目前逐漸運用於企業及非營利機構人力資源管理領域中，特別是許多機構開始以「學習型組織」為發展目標。此概念最早是由雷維（J. Lave）和溫格（E. Wenger）在情境學習的相關研究中發展出來（Lave and Wenger, 1991），後由溫格持續投入研究，才逐漸被成人教育界及企業的人力資源管理及組織發展所應用。實踐社群的組成係自發性的，成員志願參與，並透過持續互動與對話的社會學習過程中來產生知識（Wenger, 1998, 2000, 2002）。

博物館專業實踐社群的建立與發展，實奠基於具備政治（political）及準政治（quasi-political）的能力，以確保反思對話的關係持續進行。德國社會學家貝克（Ulrich Beck）特別強調「準政治」之於失控社會的重大影響力：即正

式機制外群體的或機構的活動，在準政治舞臺上發展的群體或活動對傳統的政治機制會產生很大影響（Beck, 1995）。換言之，博物館工作者若能自發性地在館內或館外找到並形成專業社群，更易於進行「意識化」過程的反思學習與行動。

「博物館真正的導航系統不應該來自政治，或無專業認知的領導者，而是由全世界博物館同業一起建立的專業倫理和其對公共服務的共識。」³以博物館專業為職志者透過持續對話互動的過程與行動，形成專業實踐社群。博物館專業實踐社群的集體意識與行動，係對抗各種意識型態以及政治宰制的反制力來源所在。在充滿變動與不確定的風險管理時代，博物館專業實踐社群的建立與發展有其無可替代的必要性。否則博物館專業主體必然輕易在各種權力及主觀意識型態運作下，被非專業者以「活化博物館」為名移除，博物館將逐漸形成無專業狀態，即任何人皆可以「創意」為名，把博物館變成馳騁個人想像力的實驗場。

社會學家古德（William Goode）指出專業人員基於自治而形成的專業社群（professional community）包括以下特性：強烈的認同、終身會員、類似的價值觀、特定角色、共同語言、自我約束、明顯的範圍領域（boundaries）、共同選擇會員（August, 1983）。博物館正式、非正式、跨國性、全國性以及地方性專業社群的形成與建立，係博物館專業發展的重要基石，係建立專業主體性的重要利器。而博物館專業倫理則為實踐社群進行意識化學習過程與行動時的重要依靠，正如博物館學者艾德森（Gary Edson）所言：「倫理係促使博物

³ 此三句話語係本篇文稿審稿人建議補充「崇尚專業倫理的博物館社群」內容時的用語，筆者在此引用並對審稿人的提醒與建議致上謝意。

館適當活動與判斷的客觀推理泉源 (source)。(Edson, 2009: 5) 例如成立於1889年的英國全國博物館專業組織「博物館協會」(Museum Association, 簡稱MA) 以及成立於1906年的美國全國博物館專業組織「美國博物館協會」(American Association of Museums, 簡稱AAM), 為幫助各類型博物館實踐使命價值及發揮潛能, 除以認證、培訓及研討會等方式積極發展各種讓博物館工作人員對話互動的成長機會外, 亦重視博物館專業倫理的建立與推動。

專業倫理守則為專業社群的集體共識與基本遵從規範, 需要透過不斷的對話溝通與討論。近年來, 由於社會快速變動, 博物館之於專業倫理規範的需求更加迫切。成立於1906年的AAM於1991正式將倫理守則的內容納入理事會重要討論議題, 直至2000年始正式公告為美國博物館界共同遵守的《倫理守則》(Code of Ethics for Museums)。成立於1947年的加拿大博物館協會(Canadian Museums Association, 簡稱CMA) 則於1999年正式公告加拿大博物館社群的博物館規範(CMA Ethical Guidelines), 做為博物館營運以及博物館人專業實踐的最基本原則。成立於1946年的國際博物館協會(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Museums, 簡稱ICOM) 為博物館界跨國交流互動的專業組織, 為使博物館實務工作有所依歸, 於20世紀1970年代開始集結世界博物館界專家學者, 進行專業倫理規章的制定工作。1986年, ICOM正式頒訂《專業倫理規章》(Code of Professional Ethics), 並由倫理委員會持續進行討論, 於2001年及2004年的ICOM大會中完成修訂。

倫理守則為博物館實務基本依歸,

除整體共通必要規範外, 不同專業社群依特定主題範疇的實務工作建立特定的指導原則。以AAM為例, 除《倫理守則》外, 還針對特定需求訂定《理事會規範》(AAM Board of Directors' Code of Conduct)、《AAM職員工作守則》(AAM Employee Handbook)、《AAM同儕審查手冊》(AAM Peer Review Manual)、《捐贈權法則》(Donor Bill of Rights) 以及《AAM倫理指導方針》(AAM Ethics Guidelines)。而《AAM倫理指導方針》包括《有關考古文物及古藝術的處理原則》(Standards Regarding Archaeological Material and Ancient Art)、《展示租借文物指導方針》(Guidelines on Exhibiting Borrowed Objects)、《處理非法取得的納粹時期文物指導方針》(Guidelines Concerning the Unlawful Appropriation of Objects During the Nazi Era)、《博物館發展經營企業贊助指導方針》(Guidelines for Museums on Developing and Managing Business Support)、《博物館發展經營個人贊助指導方針》(Guidelines for Museums on Developing and Managing Individual Donor Support)。⁴

博物館專業實踐社群因實務工作的需要而集結發展, 在經過長期討論溝通後, 逐漸發展出有助專業實務工作進行的倫理守則。如全美美術館館長協會(Association of Art Museum Directors, 簡稱AAMD) 確立的倫理守則(AAMD Code of Ethics)、太平洋島博物館協會(Pacific Islands Museums Association, 簡稱PIMA) 確立的倫理守則(PIMA Code of Ethics for Pacific Islands Museums and Cultural Centers)、AAM教育委員會(Standing Professional

⁴ 上述AAM實務倫理的相關守則及指導方針內容可參見網站 <http://www.aam-us.org/museumresources/ethics/index.cfm>。

Committee on Education of the AAM，簡稱EdCom）確立的《博物館教育卓越實務原則》（Excellence in Practice: Museum Education Standards and Principles）、博物館商店協會（Museum Store Association Museum）確立的倫理守則（Museum Store Association Code of Ethics）、全美博物館展覽協會（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Museum Exhibition，簡稱NAME）所確立的倫理守則（NAME Code of Ethics）等，甚至博物館志工也有其專屬的組織（World Federation of Friends of Museums）及倫理守則（Code of Ethics for Museum Friends and Volunteers）。有關保存維護、藝術品仲介、考古文物挖掘等亦有其專屬社群及倫理守則。這些倫理守則及相關指導方針的形成及確立，成為博物館專業發展的重要基石。透過專業實踐社群的集體力量，博物館相關倫理守則之於實務工作的協助，逐漸鞏固博物館不可輕易取代的專業主體性。

除專業知能、組織、期刊以及進修訓練外，「自律」、「高度自主性」以及「專業倫理規章」等被社會學者認定為「專業」成立的必備條件（Lieberman, 1956; McDowell, 1991; Edson, 1997）。實用主義認為政治是以倫理的承諾和實踐行動為依歸；能動性是進行政治活動所需要的（Barker, 2003）。博物館專業倫理守則係博物館實務的指導方針，各國博物館專業人員必須建立所屬的專業社群，群力發展出適用於其國情與需求的倫理規範。臺灣第一所博物館成立至今已有百年歷史，近十年來新的大小型博物館更如雨後春筍般的出現，在各種權力較勁的生存發展環境中，各類博物館

專業實踐社群的建立與發展有其不可或缺的必要性，而屬於臺灣博物館界自身的專業倫理守則及相關規範，更是博物館反躬自省必備的儀表規準。正如ICOM《專業倫理規章》（Code of Professional Ethics）」序文中特別表明該守則所呈現的是國際博物館社群所普遍接受的原則，但僅為博物館應遵守的最低專業規範（a minimum standard），各國或特定組織應在此守則基礎上發展所屬的規範（ICOM, 2006: iv）。

在此似是而非、似乎任何人都可以進行「博物館專業工作」的失序時代，缺乏清楚意識及專業導航機制的博物館實務工作者，難以發展出能動性及政治行動，在博物館生活世界中擁有真正的專業主權。缺乏可以分享成長的專業社群，不具專業倫理知識與態度，臺灣博物館界的許多工作人員，包括館長及資深館員，如何能擁有免疫於絕對主權宰制的抗體？博物館館員如何能充滿自信的區辨是非對錯？在ICOM倫理守則的基礎共識上，參考英美等國已有的專業規範⁵，臺灣博物館界不僅應該，而是必須建立足以反制非專業勢力的專業共識與規範機制。以政治及準政治方式，發展正式及非正式的專業實踐社群，共同討論並確認博物館真實的價值所在及專業身分認同。

結語

對於專業博物館人而言，在博物館的生活世界中，政治是醜陋的權力遊戲？還是運用權力讓機構或社會產生力量的實踐行動？有人的地方就有政治，政治係管理眾人之事，是一群人進行集

⁵ 臺灣和英美等國的國情文化以及社會環境不同，筆者在此僅建議以「參考」而非「複製」的謹慎態度，瞭解英美等國博物館專業發展機制。臺灣和世界上每一個國家一樣，皆應由國內博物館界從業人員自身發展的專業社群，群力建立屬於臺灣博物館專業的能動性與政治行動。

體決策與行動的過程。政治是「運用權力影響政府行為性質和內容的方法」，權力是能實現一個人或一個群體成員的目的，或推進他們所持利益的能力（Giddens, 2001）。「政治是人類各層次的互動關係中，權力的存在證明與關係」，權力透過意義的暫時穩定，深藏在文化領域的建構、規範與競爭中（Barker, 2003）。就如同傅科的提醒，權力係指「產生力量，使力量成長，並且指揮力量。而不只是阻止力量，讓力量屈服，甚至是摧毀力量的東西。」（Foucault, 1980: 136）絕對的權力，使人絕對的腐化。專業博物館人透過發展清楚意識及意識化的反思行動過程，才有可能使博物館避免絕對權力的形成，去除絕對主觀的宰制。

現代劇場大師史坦尼斯拉夫斯基（Konstantin Sergeevich Stanislavsky, 1863-1938）曾提醒演員不要妄自菲薄：

「只有渺小的演員，沒有渺小的角色」（李立亨，2000: 98）。不論以什麼樣的職位或角色在博物館世界中工作，若誠心以做為專業博物館人為職志，便應盡力知曉明白博物館結構與因果關係，願意面對情勢，透析實務行動與機構文化的政治意涵，選擇以政治方案來實踐專業博物館人的道德勇氣與倫理意識。面對亂象叢生的博物館現況，臺灣博物館界正處於反制宰制、專業發展的關鍵時刻。臺灣博物館專業工作者唯有透過實踐社群的集體動能，嘗試在權力較勁的過程中進行反思實踐的寧靜革命，才能充分發揮能動性及政治行動力，使博物館在對的時間、對的空間，做對的事。

誌謝

本文感謝兩位匿名審查者提供寶貴的意見，使本文更臻完善。

參考文獻

- 王嵩山，2005。想像與知識的道路：博物館、族群與文化資產的人類學書寫。臺北：稻鄉出版社。
- 五觀藝術管理公司譯、Waidacher, F. 原著，2004。博物館學：德語系世界的觀點。臺北：五觀藝術管理公司。
- 李立亨，2000。我的看戲隨身書。臺北：天下文化出版公司。
- 南懷瑾，2006。南懷瑾演講錄。臺北：老古出版社。
- 張春興，1989。張氏心理學辭典。臺北：東華書局。
- 陳玉慧，2010。義大利未來博物館開幕了，世界日報，2010/05/30。
- 楊少強，2005。管理學之父彼得杜拉克辭世：他不僅是理論家，更是實踐者。商業周刊，2005/11/21，頁：54-56。
- 漢寶德，2004。我們需要博物館人嗎？當代藝術家之言，秋分號，頁：8-11。
- August, R. S., 1983. So you want to start your own profession! Fable, fulfillment, or fallacy? *Museum Studies Journal*, 1(2): 16-24.
- Barker, C., 2003. *Cultural Studies: Theory and Practice*. London: Sage.
- Beck, U., 1995. *Ecological Politics in an Age of Risk*.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Berger, P. 1969. *The Social Reality of Religion*. London: Faber and Faber.
- Berger, P. and Luckmann, T., 1966.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Reality: A Treatise in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 Garden City, NY: Doubleday.

- CMNC (Commission on Museums for a New Century), 1984. *Museums for a New Century: A Report of the Commission on Museums for a New Century*. Washington, D.C.: The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Museums.
- Dalai Lama, 2005. *The Universe in a Single Atom: The Convergence of Science and Spirituality*. New York: Morgan Road Books.
- Du Gay, P., 1996. *Consumption and Identity at Work*. London: Sage.
- Edson, G., 2009. Practical ethics and the contemporary museum. *Museology Quarterly*, 23(1): 5-24.
- Edson, G. (Ed.), 1997. *Museum Ethics*. London: Routledge.
- Foucault, M., 1977. *Discipline and punish*. London: Allen Lane.
- , 1980. *Power/knowledge*. New York: Pantheon.
- , 1986. *The Care of the Self: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Vol. 3)*. London: Penguin.
- Freire, P., 1972. *The Pedagogy of the Oppressed*. Harmondsworth, England: Penguin Books.
- , 1974. *Education for Critical Consciousness*. London: Sheed and Ward.
- Giddens, A., 1984. *The Constitution of Societ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 1999. *Runaway World: How Globalisation is Reshaping Our Lives*. London: Profile Books.
- , 2001. *Sociology*. Cambridge, UK: Polity Press.
- Gramsci, A., 1971. Culture and ideology hegemony. *In: Hoare, Q. and Nowell-Smith, G. (Eds.), 1971, 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 pp. 323-35. London: Lawrence & Wishart.
- Habermas, J., 1987. *The Theor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 Oxford, England: Polity Press.
- Hooper-Greenhill, E., 2006. Studying visitors. *In: MacDonald, S. (Ed.), 2006, A Companion to Museum Studies*, chapter 22, pp. 362-376. Malden, MA: Blackwell Publishing Ltd.
- ICOM, 2006. *ICOM Code of Ethics for Museums*. Paris, France: 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Museums, ICOM.
- Jarvis, P., 1992. *Paradoxes of Learning: On Becoming an Individual in Society*. Jossey-Bass, Inc.
- Kavanagh, G., 1996. Making histories, making memories. *In: Gaynor Kavanagh (Ed.), 1996, Making Histories in Museums*, pp. 1-14. London: Leicester UP.
- Lave, J. and Wenger, E., 1991. *Situated Learning: Legitimate Peripheral Participation*.
- Lewis, J., 2002. *Cultural Studies: The Basics*. London: Sage.
- Lieberman, M., 1956. *Education as a Profession*. New Jersey: Prentice-Hall.
- McDowell, B., 1991. *Ethical Conduct and the Professional's Dilemma*. New York and London: Quorum Books.
- Mezirow, J. and Associates, 1990. *Fostering Critical Reflection in Adulthood: A Guide to Transformative and Emancipatory Learning*. San Francisco: Jossey-Bass.
- Rabinow, P., 1984. *The Foucault Reader*. New York: Pantheon.
- Schön, D. A., 1983. *The Reflective Practitioner*. London: Temple Smith.
- Silverman, L. H. and O'Neill, M., 2004. Change and complexity in the 21st-century museum. *Museum News*, 83(6): 36-43.
- Suchy, S., 2004. *Leading with Passion: Change Management in the 21st-century Museum*.

- Walnut Creek, CA: Altamira Press.
- Suin, D., 1976. 'Utopian' and 'scientific'. *Minnesota Review*, NS6.
- Wenger, E., 1998. *Communities of Practice: Learning, Meaning and Identity*.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Wenger, E. C. and Snyder, W. M., 2000. Communities of practice: The organizational frontier.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78(1): 139-145.
- Wenger, E. C., McDermott, R. and Snyder, W., 2002. *Cultivating Communities of Practice*. Boston: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 Williams, R., 1983. *Keywords: A Vocabulary of Culture and Society*. London: Fontana.
- Woodman, E., 2010. Zaha Hadid's Maxxi art gallery in Rome: Stunning building, terrible gallery. 3:10PM BST 24 May 2010.

收稿日期：2010年6月9日；接受日期：2010年6月30日

作者簡介

本文作者現任輔仁大學博物館學研究所副教授。

De-oppressing Oppression: Museum Workers' Agency and Political Actions

Wan-Chen Liu*

Abstract

Where there are people, politics exists. The game of power and culture politics takes place everyday and influences the world of every museum worker. No matter whether the museum worker endorses the political environment or not, he/she cannot avoid the influence and must develop skills to deal with such conditions.

This paper briefly reflects on the phenomenon of ideological hegemony and oppression among stakeholders in the museum world. The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actionism, it articulates the options for museum workers as active agents to “de-oppress” existing oppression within their professional subjectivity for improving the chaos of museum conditions. Adopting the concept of consciousness and clarifying the inter-influence of museum political powers and museum workers' agency, the author confirms the importance of conscientization and perception transformation learning that museum workers need to continually experience. Critical museum workers as reflective practitioners require a “community of practice” inside or outside the museum to act as an informal “de-oppressing team.”

Keywords: museum politics, museum sociology, consciousness, conscientization, agency

* Associate Professor, Graduate Institute of Museum Studies, Fu Jen Catholic University;
E-mail: 054117@mail.fju.edu.tw